

# 边际人的报国心

## ——容闳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新论

罗福惠

**摘要** 容闳是近代中国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第一人,一生在中美“两栖”。他认为当时中国贫弱危殆的症结有三:一是政治腐败,二是教育落后,三是外力入侵,其认识出自直观感受但亦不断深化。在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四个时期,容闳尽力以“供赞画、任交涉”的方式报效祖国,推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但容闳对于中美两国,都处于“边际人”地位,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设想亦难免脱离实际,又不为晚清当局信任和重用,美国有关人士对其亦显出轻视,故其赞画、交涉多未能奏效。但容闳一心报国、无怨无悔的崇高精神值得后人钦佩与发扬。

**关键词** 容闳 边际人 报国心

容闳还在美国求学的时候,就立定了“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①</sup>的报国宏愿。此后半个多世纪,他为此目标尽瘁心力。截至目前,关于容闳的研究和评论不可谓不多,但几乎都没有从边际人这一角度来作观察和思考。可以说,容闳是边际人中的杰出爱国者。他的思想很少有传统色彩,规划与行动富于借鉴和探索精神,皆起因于他的边际人特征;而其计划和行动多数归于夭折,或只能在他人手中变相实现,也同他的边际人地位有关。

### 一、对祖国落后症结的三点认识

容闳对祖国贫弱落后乃至面临巨大危机的认识,具有直观但逐步深入的特征。他 18 岁赴美留学以前,在家乡生活 9 年,在澳门和香港读书 9 年,其在祖国的经历,限于珠江三角洲一隅,家乡的种种情形,应该已有初步印象。在美国耶鲁大学“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sup>②</sup>这种感触显然来自他将原有的家乡印象与此时在美国的见闻对比。在美国,1847—1854 年有关中国的报道和深入研究还很少,所以容闳对祖国的问题尚无更多更深刻的了解,而归国以后的所见所遇,逐渐使他形成了三点最主要的认识。

其一是政治的腐败。这首先起于 1855 年容闳在广州所见到的大屠杀。当时广东人民因受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多处举行起义,两广总督叶名琛施以残暴镇压,一般虎狼胥役乘机敲诈诬陷,官府不加审讯甄别,于当年夏天滥杀“七万五千余人。以予所知,其中强半,皆无辜冤死”。此事使容闳深受刺激,“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sup>③</sup>。这次耳闻目睹的惨剧不仅使容闳初次体验到中国官吏的恣意妄行和政治黑暗,也为容闳后来到天京(南京)访问洪仁 作了若干思想铺垫。70 年代容闳在操办留美幼童管理和调查秘鲁华工受虐

收稿日期: 1998-09-24

待的情形时,尽心负责而屡遭攻击;而陈兰彬等“怯懦鄙夫”,“即极细微之事,亦不敢担负丝毫责任”反获升迁,这使他感到“政界中往往有此不平之事。无功受禄转来不虞之誉;劳苦功高反有求全之毁”。1896年容闳开办银行的计划被盛宣怀用贿赂权贵的办法破坏,更使容闳愤怒,称当时“尊自太后,贱及吏胥,自上至下,无一不以贿赂造成……吾人之在中国,只需有神通广大之金钱,即无事不可达其目的。事事物物,无非拍卖品,孰以重价购者孰得之”<sup>①</sup>。容闳于晚清弊政谈得并不多,但仅此数点就足以使他萌生并坚持政治改革的愿望

其二是因为教育的陈旧落后造成人才的极度缺乏。容闳回国以后,重温祖国语言文字,深感中国方言之不统一及掌握中国文字之困难,进而感知中国国民多为“未受教育之人”,一般群众均“无知识”、“迷信而顽固”<sup>②</sup>。许多掌权者和欲干大事业者尽管接受过教育,但因当时的教育不“完全”,知识有缺陷,因而不能应对新的局势。容闳曾具体谈到他对太平军的观感,认为起义者从战士到领袖,宗教信仰和知识“皆甚浅陋而简单”,道德“乃每下而愈况”,“领袖人物其行为品格与所筹画,实未敢信其必成”<sup>③</sup>。谈到曾与自己共事、而暗中极力活动撤回留学幼童的陈兰彬时,容闳称这位翰林出身、曾任刑部主事垂20年的饱学之士“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见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sup>④</sup>,故这种人必然排斥新知和反对借鉴他人事物。而在1898年中国讨论修筑天津至镇江的铁路时,以山东为势力范围的德国居然不准铁路通过该省,“中国国力孱弱,不能提出此问题,以争回固有之主权。而外交部中亦无人能引证条文,驳斥德国要求之无理,深恐惹起国际交涉,一惟外人之命是听”<sup>⑤</sup>。他认为中国在外交中任人欺凌愚弄,固然主要是因为国力孱弱,但缺乏国际法知识、缺乏外交人才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这显然也是教育不成功的表现

其三是外力的侵入。容闳对外国势力给中国造成危害的认识有一个深化过程,50年代末容闳为洋商调查和收购丝茶时曾遍历浙、赣、皖、湘、鄂诸省,其感受是中国地大物博,“设中国无欧西各国之干涉,得完全行使其主权”,仅长江流域的物产和航运之利,就足以中外无数人口造福。他感叹“彼西人者,何不予中国以时机,俾得自行解决其国内问题耶?又如工人问题,自有欧西之汽船电气及各种机械输入中国以来,中国工界乃大受其影响,生计事业,几已十夺其九。非谓不当输入中国,第当逐渐推行,假以时日,俾人民得徐图他项事业,以恢复元气,不宜骤然尽夺其所业也。”<sup>⑥</sup>其态度的软弱天真,可说溢于言表。1894年中日发生甲午战争,“战事既开幕,予之爱国心油然而生,乃连发两书,寄予友蔡锡勇君,……每书皆有条陈,规划战事,可使中国与日本继续战争,直至无穷期而不竭。”<sup>⑦</sup>显然他是认为这次战争关系中国前途甚巨。而到1900年容闳参与其间的自立军起事和上海国会活动失败后,他曾明确地说当时中国面临“瓜分之局”。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远在美国的容闳已病卧在床,他在致国内革命人士的书信中,呼吁全体革命者务必团结一致,称“自相残杀的战争肯定会导致外国干涉,这意味着瓜分这个美好的国家”;他尤其担忧“掠夺成性的列强在北京,将有压倒一切的权力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强调“新中国应该由地道的中国人管理,而不应当由骑墙派和卖国贼掌管,因为他们让欧洲掠夺者干预我国的内政”<sup>⑧</sup>。可见辞世不久前的容闳对列强的干涉中国内政和瓜分中国的野心,已有充分的认识和高度的警惕

容闳不擅长理论,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缺乏系统的分析和表述。他的这些零星片断之论,一是源于他的直观体验,二是受到与其交往的中国人的影响。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由于中国危机加剧,同时他与维新派和革命派交往较多,因而在思想上出现了可贵的飞跃

## 二、供赞画、任交涉的四个阶段

容闳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抱负,1854年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即匆匆返国,由于在国内没有任何根基和援手,所以在1860年以前的几年中,他只能把“谋食”与“谋道”结合起来,以便站住脚根并且寻找机遇。在此期间,他为了融入中国社会,重新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同时利用原有的外国师友关系,在穗、港两地短期当过外国人的“书记”、律师助手。1856年赴上海后,进过海关翻译处,曾为洋行和洋商当过“书记”和“代表”(实质仍是买办),同时广交“商学上流人物”,抓住机会发挥自己的外文优势,使“上海之中国人几无一不知予为美国毕业生矣”<sup>⑥</sup>。这些活动可视为容闳实施报国行动的准备和前奏。

从1860年到1912年,容闳的活动恰与中国晚清历史上的太平天国革命(后期)、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前段)相关,联系考察容闳在各阶段的所思所行,是评价容闳不可缺少的环节。

1860年冬,容闳抱着了解“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等问题的目的到过天京,向干王洪仁 提出七条重要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并且表示“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君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即向干王所提七条建议——笔者),则予必效奔走”。结果,虽然太平天国授予他四等爵,而且他亲见太平军与老百姓关系不错,对洪仁 、李秀成、陈玉成的评价也不差,但因太平天国不能立即决定并答复他所提建议,尤其是他认为“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sup>⑦</sup>,终于谢绝了封爵和挽留,很快就离开了天京。容闳与太平天国革命虽然仅此一段关系,但他的七条建议的内容,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因为他此后的多次设想和建议基本上是这七条建议的发挥、深化和丰富。

第二阶段,即容闳与洋务派乃至清政府发生关系的阶段,时间较长。1863年,由于容闳在上海所结识的李善兰的推荐,曾国藩在安庆接见了容闳。曾国藩对容闳表示赏识,容闳则认为曾国藩“才识道德均有不可及者”,“对于博学多才之士,尤加敬礼,乐与交游”,“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故视曾国藩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sup>⑧</sup>。由于容闳事前已从李善兰等人处得知曾国藩邀他为了商量办机器厂一事,故他在回答曾国藩“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事业,当从何处着手”的问题时,暂时不提心中酝酿已久的培养人才的教育计划,而答以购买“制器之器”,建立机器总厂的设想。于是曾国藩授予容闳五品军功,委其携款赴美国购置机器。1865年机器购回后,在上海高昌庙建成江南制造局。两年后,容闳又向曾国藩建议在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亦被采纳。容闳因完成购买机器一事获五品实官、候补同知资格,任江苏抚署译员。

约在1868年,容闳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向文祥提出四条建议,请其代奏。这四条建议是:“一、中国宜组织一合资汽船公司。公司须为纯粹之华股,不许外人为股东,即公司中经理职员亦概用中国人。”“二、政府宜选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三、政府宜设法开采矿产以尽地利,……不可不筑铁路以利交通。”“四、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无论何国教会,除关于宗教者外,皆不得有权以管理奉教之中国人。”<sup>⑨</sup>这个条陈因为种种原因未见回音,直到1870年才由曾国藩等专就派遣留美幼童一事上奏获准。1871年开始招生并集中在上海补习训练,次年夏末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启程出国。容闳担任中国留美

学生副监督,约从 1875年起还兼任驻美副公使。关于这期间围绕着留美幼童的争论及四批幼童终于在 1881年未学成而撤回等事,历来研究已多,兹不述

在此期间,容闳曾获李鸿章批准,花 10 万美无购买 50 尊新式格林炮回国。随后他又曾捐款,购买了一批美制枪炮弹药运回。约在 1881 年秋,容闳回国交卸差事,在京、沪两地滞留一年多,于 1883 年春返美与妻儿团聚,这次离开中国长达 12 年。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容闳出于报国之心,通过蔡锡勇向张之洞提出两个设想,主旨是反对议和,为此建议“中国速向英国商借一千五百万元,以购已成铁甲(舰)三四艘,雇用外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一面由中(国)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于欧西无论何强国,借款四万万美金,以为全国海陆军继续战争之军费”<sup>⑥</sup>。张之洞赞同第一策,令容闳自美赴英与英国银行谈判。由于李鸿章一意主和,阻挠张之洞的借款活动,容闳的两条设想均以失败告终。1895 年夏容闳奉张之洞之命回国,在南京见到张之洞时,向张之洞提出“新政策”,即“政府至少须聘外人四员,以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之顾问,……其所陈之嘉言良策,政府当诚意采纳,见诸实行。此外更派年轻有才学之中国学生,处于各顾问之下,以资练习。如是行之数年,则中国行政各机关,不难依欧西之成规,从新组织也”<sup>⑦</sup>。此时容闳把挽救中国危局的希望放在政府机构的自我革新上,但张之洞显然是不能接受政治上“太新太激烈”改革的人,故对容闳的建议乃至对容闳其人很快即表示冷淡,他回任武昌时对容闳的安排和交待未置一词。

1896 年,容闳又设想了一个创办国家银行的方案,通过张荫桓和翁同龢提交京中各部大员。但由于官僚买办盛宣怀从中破坏,容闳创办中国现代银行的计划再次落空。紧接着容闳又提出营造铁路的计划,建议向外国出让修筑铁路的利权,换取借款,到了立约规定年限即可把铁路利权收回。但总理衙门没有批准这个计划。1897 年容闳具体提出了修筑天津至镇江铁路的计划,翌年初得到光绪帝批准。但这条铁路需经过山东,而德国以山东为其势力范围,故竭力反对。交涉失败后政府只许建造“一曲折之铁路”,即绕过山东,过黄河,经安徽。容闳为办成此事,“拟以此铁路让与外国公司承造”,但这样一来又对张之洞计划中的芦汉铁路产生不利影响,遭到张之洞的反对。总理衙门于是再出难题,“又命予必招中国资本,不许外人入股,且仅限予六月之期。六月之内,若不能招齐路股者,则将特许状取消”<sup>⑧</sup>。容闳预料此事“难于登天”,“势有所不能”,遂放弃这一铁路建设计划。

容闳与康、梁一派的关系始于 1896 年,他参与了“保国会”的成立;百日维新期间,他的寓所是维新人士常去聚会的地方;政变前后他曾参与营救康、梁,事后自己也被追究撤差。1900 年 7 月,唐才常等人在上海召开“国会”,容闳参与了筹画工作,被举为“会长”,“主外交”,亲自起草了英文的对外宣言。宣言表明,他们的目的是以英国政府为模式,组成“立宪政府”;承认中国与列强“签订的所有条约”;“聘请外国顾问”;“联合列强,废黜慈禧太后及其老朽顽固派和反对派同僚,恢复维新代表人物光绪皇帝的权力”<sup>⑨</sup>。容闳曾设法争取英国的支持,又为准备起事的自立军购运军火。张之洞镇压自立军时,把容闳与康有为、唐才常并列为“勾匪作乱,私运外洋军火”的要犯,容闳被迫逃往香港。1900 年以后容闳和康、梁仍有联系,梁启超、康有为在 1903 年、1905 年访美时分别与容闳见过面。当时容闳还参与了美国军人荷马李和财界人士布思帮助康、梁筹款,以训练军队的计划。到 1908 年他还一度期望兴中会、保皇会及其他力量联合起来,以武装斗争来推翻清王朝。在这之后容闳才谴责康有为把所得捐款中饱私囊,称康有为不是一个靠得住的维新者,也不再赞成康有为及其门徒的保皇主张,认为孙中山才最可信赖<sup>⑩</sup>。

容闳同兴中会的杨衢云、谢缵泰的相识始于 1899 年,次年即 1900 年又结识孙中山。当时容闳极力想促成兴中会中孙、杨两派的团结,孙中山、谢缵泰都非常尊重容闳,孙、杨两派曾经都同意以容闳为领袖。1901 年秋,谢缵泰、洪全福等人预定于 1903 年 1 月 28 日在广州举行起义,容闳对此“极表同情”,并带着争取美国支持的使命于 1902 年 5 月离开香港回美国。当然这次起义没成功,容闳在美国的活动也未见效果。1909 年初,容闳又安排孙中山与荷马李、布思相识,容闳曾向孙中山建议,会晤时应准备讨论“至少向银行借款 150 万美金,并再借款 200 万美金以备急需”、“组织临时政府”、“加强武装力量的领导”和“建立海军”等问题。稍后容闳又向布思提出了一个更详备的借款方案:借款总数为 1000 万美金,分 5 次付款,为期 10 年,年利 15%;一旦革命党在中国取得一省的胜利,将立即委任美国人为中国海关税务人员,并出让若干专利作为借款的补偿;革命党建立的新政府完全仿照美国,设正副总统、国务卿和各部部长;准备聘请外国人充当顾问或部长,如荷马李担任陆军部长等<sup>①</sup>。但这次借款也没有成功。

1911 年 10 月武昌起义爆发时,容闳早在病中,但他仍然只以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为念,曾接连写下了 5 封信寄给国内友人,庆贺革命的初步胜利,建议革命者迅速建立政府,避免无政府状态的出现,应坚持革命原则,“不管那些政治骑墙派的言辞可能多么漂亮,好象多么有理,也不能让他们把你们诱离自己本来追求一个共和国的坚定目标”。他告诫革命者“互相之间应当比亲兄弟还要密切,紧紧团结起来”,“不应该互相纠纷,陷入内部争执和内战的深渊”。他还强烈谴责袁世凯说,“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不,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齐撵走”;又指出“掠夺成性的列强”并未放弃“干涉”和“瓜分”中国的政策,尤其可能“左右袁世凯、唐绍仪一伙”,“并以袁世凯、唐绍仪控制新政府。那简直就如同满清政权重新执政一样糟糕”<sup>②</sup>。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致信容闳,高度肯定他对祖国的贡献和种种宝贵见解,请其回国。但容闳已经病重,未能成行。他临终前还嘱咐两个儿子“弃所营业,回助祖国”。

从上述容闳在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所行所思,即可看出容闳改造中国的计划的重点在人才教育和制度建设,此外还包括设立银行和修筑铁路,也注意到器物(机器、轮船、枪炮、铁甲舰等)的引进,他的现代化思想既是全面的,也是有重点的。当然,容闳改造中国的计划离不开开放和向外国学习借鉴,即“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sup>③</sup>。最主要的是开办各种新式学校,尤其是派遣留学生;其次如制度建设,君主立宪则采英国模式,民主共和则采美国模式,而且要聘外国人为顾问或者部长;他设想的汽船公司和国家银行,明显参照了西方作法;修建铁路是以出让铁路利权换得借款;甲午战争中为抵抗日本,他设想过借洋款组织雇佣军和抵押台湾筹措巨资;在帮助康有为和孙中山的事业时,他最主要的行动是通过美国人布思借款,而且数额庞大。总之,借鉴外国的文化教育和有关制度,利用外国人才和外国资金,一直是容闳的着眼点和着力点。

### 三、“边际人”的含义和困窘

容闳向西方学习,把中国建成现代国家的思想,无疑是较早的,所以此后许多先进的中国人的有关设想,为了使中国现代化采取的措施,有不少内容正是当年容闳的设想、建议乃至尝试。容闳思想的先进地位,得力于他是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对美国的教育、政治、法律、经济等等状况有较多了解,在大多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还不甚了了的时候,他却能多方面地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一些具体建议。而容闳的绝大多数计划落空、行动失败,除了为当时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整体局势所决定之外,也与他的“边际人”角色有关。

容闳从少年时起,在澳门和香港的教会学校读书将近 9 年,然后赴美国留学 8 年,总共接

受西方教育 17年,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系统教育,也基本上使其知识论、价值观和社会观得以定型。从 1854年他大学毕业返国到 1912年春在美国逝世,58年中他大约有 26年生活在中国,32年生活在美国,可说一生是在中美“两栖”状态中度过。容闳不仅崇拜美国的文化教育和各种制度,而且已在 1852年 10月登记归化为美国公民,视美国为其“第二祖国”。当 1864年他在美国订购江南机器局的设备时,美国南北战争正在进行,容闳觉得应该利用等待交货的半年时间,“投效美政府,尽六阅月之义务”,“且此六月内,予当自备资金,不敢耗美国国帑”,“以表予忠爱美国之诚”<sup>⑧</sup>,但被礼貌地拒绝。

容闳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所以他不仅有前述为报国所提的各项建议和采取的行动,在与外国人或外国政府打交道的时候,从未忘记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和中国的利益。因此外国人也把他看成是中国人。50年代末容闳在上海时,曾以“予以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人享受同等之权利”为耻,并从收入优厚的海关辞职<sup>⑨</sup>。在租界中遇到外国人仗势欺负华人,必挺身而出,据理斥责,直至以还击自卫。70年代初他在天津曾当面揭破诱使中国签订输出华工条约的秘鲁专使的花言巧语,向直隶总督陈述华工在途中和出国后所受的非人待遇。随后奉命赴秘鲁调查华工情形时,努力收集华工受虐待的有力证据,寄回国内,阻止李鸿章与外人订约。1878年美国同孚洋行为秘鲁拐运华工,容闳等人照会美国提出抗议。1879年至 1880年,美国发生排华事件,他又两次与美国交涉。在此同时,因留美幼童中已有部分人年龄渐大且程度较高,容闳曾致书美国国务院,要求安排数人进入陆海军学校学习,但国务院复书“以极轻蔑之词简单拒绝予请,其言曰此间无地可容中国学生。嗟夫!中国之见轻于美人,其由来也渐矣”。当 1872-1881年容闳在美国担任留学生副监督兼任副公使期间,他深感“美人种族之见日深,仇视华人之心亦日盛”<sup>⑩</sup>。而 1898年容闳筹画修筑天津至镇江的铁路,遭到德国政府干涉时,容闳曾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向美国驻中国公使要求美国政府支持,但美国国务卿给其驻华公使的外交训令却只以否认容闳的美国公民资格作为答复。

所以容闳虽然在美国求学和生活共 40年,几乎占其全部生命时间之半,加入了美国籍,娶了美国女子为妻,但美国之于他仍是“第二祖国”,他之于美国仍是一个“边际人”。梁启超在 1903年春游美时会晤过容闳,事后记云:“先生今年七十六,而矍铄犹昔,舍忧国外无他思想,无他事业也”<sup>⑪</sup>。但不幸的是,容闳对于祖国中华也成了边际人。

具体到容闳其人,他作为边际人的第一层意思是对祖国固有文化已相当隔膜。容闳出身农家,受教伊始即接触西方文化,直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才重新回头温习中国语言文字,但效果似不甚理想,当其要写条陈、公函之类时,还须请朋友或中文“书记”捉刀。可以说,容闳对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实在未稍窥堂奥,所以他既不能认识固有文化优在何处、劣在何处,更不能设想中国人当如何对待、处置固有文化。崇仰西学或与他经历类似的人称其学识优长,但稍为守旧者则视其不谙中学为一病。客观地说,不能兼通中西文化确实难有作为,尤其难对改造固有文化和建设新文化作出大的贡献。

第二层意思是他缺乏一种群体的归属。容闳回国以后,他既不可能同广大农民、工人多所接触,而不论对于秘密社会、中上层社会,他始终是一个“朋友”或“客人”。他出身清寒,故没有所谓世家戚谊;又不曾在国内读书科考,所以也没有同学同年等师友之交。回国之初,他在广东只能和外籍的教会人士、外交官、律师等略有接触;到上海后也先是和洋行洋商、海关洋员交往,继而结识中国商界学界人士,然后通过曾国藩门下的有关人士将自己推荐给曾国藩。通过 7年的努力,他才到达中国政治舞台的边缘。

由此而来的第三层意思是容闳的政治活动只能是利用时机,依人成事,即依靠既有的体制

内或体制外的现有力量,向握有权力者或团体组织的领袖宣传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但合于他理想的有权力者和团体组织领袖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容闳也常采取“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方式,这就使得他的有关计划多数停留于想象,少数建议虽有实施却未成功。

由于容闳具有边际人的上述特征或曰缺陷,所以尽管他改造中国的设想具有明显的先进性,也确实为当时的中国所必需,但它却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这些设想和计划在贯彻实行中如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二、依靠什么力量来贯彻实行这些设想和计划?对于第一点,容闳始终没有认识,而以为要改造中国,只须把西方先进的东西移植进来就行,所以1866年当他以为美国人派森的《契约论》于中国法律甚为有用,请一文士共译时,该文士就指出有些外国法律条文“实不合于中国情势”,译出亦无大用;1896年容闳与黄开甲翻译了美国的国家银行律,并用作参照,制订了自己的国家银行计划,张荫桓将译本和计划读后,亦以为照搬过多,“谓其中有若干条,不合于中国国情,难期实行”<sup>⑧</sup>。显然容闳的设想和计划中难以切合中国实际的不仅限于上述几点,他的许多建议和设想都难免有类似的缺陷。

关于第二点,即依靠什么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计划问题,必然更受制于客观条件。容闳最先是利用外国传教士和自己与洪仁 的关系,试探太平天国领导人能否实施自己的建议,知其必不可能后即毅然舍去。然后与洋务派及清政府周旋磨合三十余年,曾国藩称容闳“庶几闳毅之选,不仅通译之材”<sup>⑨</sup>、“为中国可造之才”<sup>⑩</sup>;李鸿章也称容闳“洋学及西国律法探讨颇深,洋情既熟,……其志趣尚知要好”<sup>⑪</sup>,因而是办理洋务、对外交涉的合适人选。但是他们只要容闳按照官府的指示办事,容闳的多项建议恰恰招致了他们的猜疑。除了留美幼童功亏一篑终被撤回之事以外,可证明他们并不信任容闳的事例甚多。如1869年前后容闳在上海筹组华商汽船公司,希望曾国藩支持,但曾国藩却在致总理衙门函中提出疑问,“果否是华商集事?保无洋人及买办在内?殊难究悉。若无此辈,未必能依照外国公司办法”,并指示上海道“留心查访具复”<sup>⑫</sup>。华商轮船公司因缺乏支持而未能问世,但三年后名为官商合办,实由李鸿章掌握大权的轮船招商局应运而生。到1896年,容闳创办国家银行的计划被盛宣怀破坏,而次年5月朝廷就宣布授予盛宣怀开设国家银行全权。还有前述总理衙门以不准招洋股、借洋债及委托外国公司建造等条件,实际上收回了已经答允容闳的营造铁路特许。甲午之后朝廷出卖各种利权、举借外债已屡见不鲜,只不过这些事只能让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人包办,不能由容闳经手罢了。

不仅如此,官场中对容闳的批评、非议越来越严厉。70年代,李鸿章还只说容闳“汉文未深,又不甚知大体,亦是一病”<sup>⑬</sup>,并把容闳与顽固守旧的陈兰彬对比,称“容闳为人诚不如荔秋之颠扑不破”<sup>⑭</sup>。又批评容闳在留学生问题上“意见偏执”、“固执己见”<sup>⑮</sup>。到1898年5月徐桐参奏张荫桓时,就把梁诚、容闳一同加以打击了,他说“又闻张荫桓与其同乡人道员梁诚、容闳等,与洋人时相往返,行踪诡密。……国家之密谋大计,何一不可输于洋人”<sup>⑯</sup>。已把“莫须有”和“株连”二法并用。1900年容闳因参加上海中国国会活动及为自立军购运军火,张之洞下令通缉他。容闳同洋务派及清政府长达三十多年的磨合终究磨而不合,并自此不欢而散。

容闳生前的最后十余年,把实现自己计划的希望先后寄托在维新派和革命派身上,根据他一贯要借重外国人才和资金的思路,他向两派都介绍过荷马李和布思,但最终一分钱也没有借到。内中枝节尚未见有史料说明,但有一点不难想见:西方财界人士和银行此时仍在给清政府贷款,民国初年又曾给袁世凯借款,这如果不是出于政治上的好恶,那就只能是出于利益权衡,借钱给清政府和袁世凯肯定有丰厚回报,而对前景不明的流亡者借钱,谁知道后果如何呢?所以当容闳此前受清政府委托与西方国家的政府、银行打交道的时候,尚有门可入;而此时则好象无门可进了。概括地说,容闳所计划的事业的失败,前段主要是因为洋务派及清政府对他这

个边际人的猜疑,后段则主要是因为美国财界和政府对他这个边际人的轻视。

造成容闳的悲剧人生的时代已经过去,而容闳勇于向外国学习借鉴的开放态度,特别是他一心报国、无怨无悔的精神,无疑是值得后人钦佩和发扬光大的。中国在 21 世纪的伟大事业,需要全体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努力。有一句歌词说得好,“留住我们的根”;但还须加上一句:维护和改造好我们的土。因为土是把根留住的前提,根是土存在的意义,二者不可分离。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3; 22; 30- 31; 104- 105 120; 62 89; 62 60 57; 102; 120- 121; 45; 114; 40; 50 56- 57 63; 71- 73; 86- 88; 114 116- 117; 121; 88; 80; 35- 36 105- 106; 85; 118; 84页。

①②③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25 323; 320; 323- 325 页。

⑱ 周锡瑞著、杨慎之译:《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30 页。

㉑ 《布思文书》,转见袁鸿林《容闳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㉒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4 页。

㉓ 曾国藩:《复丁雨生都转》,见江世荣编《曾国藩未刊信稿》,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65 页。

㉔④ 《论派员查办秘鲁华工》,见《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1905 年金陵刻本,第 34 页。

㉕ 《总署致两江总督曾国藩函(附曾国藩原函)》,载台北近代史所编《海防档(甲)》,1957 年版,第 876 页。

㉖ 李鸿章:《光绪三年七月十八日复郭筠仙星使》,见吴汝纶编《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九,莲池书社 1902 年版,第 16 页。

㉗ 李鸿章:《光绪六年四月二日复陈荔秋星使》,见《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二十二,第 7 页。

㉘ 《徐桐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七日参张荫桓贪奸误国折》,转见袁鸿林《容闳述论》

#### 参考文献

[1] 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 李喜所:《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

[3] 何晓明:《百年忧患——知识分子命运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东方出版中心 1997 年版。

作者:罗福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79

责任编辑 沈继成

### 章开沅教授《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 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

章开沅教授的“贝德士研究”系列之一《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自 1995 年出版以来,不断引起海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在 1997 年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纪念之际,海内外百余家媒体对此作了详细报道。1998 年该书又荣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为进一步发掘史料,揭露日军在南京所制造的惨剧,章氏夫妇于 1998 年 4 月- 9 月再次赴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复印回一大批当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的书信、日记等珍贵资料。这批资料同贝德士文献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而且可以互相参证。章教授当下正在将这些资料整理编译,并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于年内出版发行。

(家峰)



##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 **Interest and the System an Analysis of Factors behind Democratic Election** by Xu Yong

Along with democratic elec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villager self-government in the countryside rising to prominence, there have appeared two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it in theoretical circles. One attitude lays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form of democratic election, while the other negates this system completely. This paper,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wo elections for the village head in the Yue Village, have drawn three conclusions. One is that democratic election as a form of governing is necessary in the present countryside. The other is that democratic election as one way of distributing resources of power and of involving villagers may not produce the expected results. The third is that the mechanism of the election is not yet perfect, but it can help shift the power in an orderly way and correct possible errors.

###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xegetical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by Zhou Guangqing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review both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exegetical studies in the 20th century on the basis of the forward position of the humanities'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exegetics was originally a field of study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records, the main aim of which was to study comprehensively our predecessors' practice and comment on their research findings, thus helping to extract theories and establish a system so as to give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ional traditions and culture. However, in the 20th century, under specific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exegetics turned away from its original course and deviated to the study of semantics.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we should resume the due mission and spirit of this field, documentary interpretation.

### **Covert Grammatical Categories in Modern Chinese**

by Xiao Guozheng

Covert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re contrary to overt ones, the latter being embodied by morphological forms or words. It is a frontier subject which faces grammatical research o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application, and the man-machine dialogue. This paper discusses, with examples, some basic contents,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this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Three aspects are involved: the composition and arrangement of linguistic symbols in form, the interpretation of structural mean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al rules of information.

### **A New Approach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Yung Wing's Thoughts and Behavior**

by Luo Fuhui

Yung Wing is the first person who embraced western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He held that there were three crucial reasons which led to China's poverty and weaknesses: (1) political corruption; (2) backward education; (3) foreign invasion. These observations were a reflection of his own personal feelings and were held even firmer later. During the periods

of several reform and revolution movements, he offered his support, gave counsels and acted as negotiator for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as an edge person, he lacke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his ideas were accordingly not very practical. He was not trusted and not highly positioned by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and his efforts were not so successful. Still, his noble patriotism and perseverance should be appreciated and carried forward.

### **An Analysis of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Misappropriation of Futures Margin**

by Peng Zhenming

Margin system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safe working of the futures market. Once the margin is misappropriated, the degree of risk in the futures market is heightened and the legitimate interest of investors prejudiced.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legal nature of margin, which is viewed as a special guarantee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puts forth a proposal for the addition of the crime of misappropriating margin in China's criminal law so that such acts are punished with penal measures. The author also inquires into the component parts, confirmation and punishment of such crimes.

### **On the Motif of 'Watching Stealthily' in *Baishui Sunu***

by Cheng Jianxian

*Baishui Sunu*, a representative snail-girl story, has been handed down for about a thousand years. One of the reasons why it can be alive is that it reveals the unconscious human desire to watch women stealthily. The motif of 'watching stealthily' is the climax of the whole story which comes from a primitive ritual in which a virgin must be separated from all other people. The archetype of Sunu originated from a virgin who was undergoing the taboo of separation. The narrative pattern of 'impose-taboo, break-taboo, expose-taboo' in the story is built on the basic primitive mentality. This pattern is followed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also found in all folktales of the world.

### **Tao's Movement between Man and Language Heidegger's Linguistic Ontology for Poetry**

by Liu Fangxi

Starting from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ather than between man and man, Heidegger regards language as functioning at the interface of man and ontological Tao. As an essential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 genuine poetry is the movement between man and Tao. In the course of this movement, Tao's silent sound becomes man's voice while man gives poetic response to Tao's call, and both obtain their essence respectively. Heidegger's linguistic ontology for poetry signifies much both to the existence of modern man an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criticism on poetry.

### **The German Military Mission and the Sino-German Relations**

by He Lan

The role the former German military mission played in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disputed issue among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tatus, the sphere of activities, and the limitation of influence of the miss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in China. The mission helped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but their activities and fate in China were controlled and restrained by the state strategies of their own country.